

【一般论文】

马华文学的欲望
——一个文学性和“友谊”的故事
Desire of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A Story of Literariness and “Friendship”

黄锦树* (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Ng Kim Chew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kcng@ncnu.edu.tw

Published online: 31 December 2020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Ng, K. C. (2020). 马华文学的欲望 ——一个文学性和“友谊”的故事.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1(2), 129-140.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1.2.6.202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1.2.6.2020>

摘要

本文为本人 2019 年 9 月 15 日受邀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赤道上制造台湾：移动中的当代马华文学”讨论会上的讲稿。因为主办单位同时邀请了李有成教授与林建国教授，我与林君虽于 90 年代末同时在台北参与马华文学论述的建构，但后来因不同的学术立场及个性、处世之道等而分道扬镳，学术对话和友谊都早已结束。针对讨论会的情境，本文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文学性”——切入，那也是我们争论的焦点。在简略的回顾我们多年来针对马华文学的论争，描述了马华文学的处境之后，同时介绍本人近年研究马华文学的某些心得。

关键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经典缺席，文学性

*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text of a talk I was invited to deliver at the “Making Taiwan on the Equator: Contemporary Mahua Literature in Motion” symposium at Nagoya University, Japan, on September 15, 2019. Although Lim and I were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n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aipei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late 1990s, we parted ways later due to our different academic positions and personalities and ways of approaching the world, and the academic dialogue and friendship have long since ended. In view of the context of the symposium,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issue from a specific perspective: “literariness”, which is also the focus of our debate.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our arguments against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over the years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 will also introduce some of my recent research experiences in such studies.

Keywords: Realism, modernism, classic absence, literary

沉默的伦理？

六年前（2013年），林建国教授在响应我对他的批评（准确的说，是响应我对他对我的批评的批评¹）时有这么一段文字：

这些马华文艺作者，白日营生，夜晚笔耕写作，毅力之大，看在我们当今一辈位居庙堂高位的人们眼里，暗暗自叹不如。他们对于文学志业，有着无比巨大的仰望，留下的是股庞大的气场，豪气外加骨气。这股无价的精神资产，就是富有。问题是，他们根本不知他们作品多么不好。忙了半天，他们依旧“经典缺席”，依旧是穷爸爸。²

喜欢把文学史问题简化为贫/富的林教授，在对马华现实主义作家一番赞叹之后，进一步给马华文学的研究者提出“三项伦理选择”：“一是数落他们是剥落的瓷砖；二是作出文学史的选择，对他们保持沉默；三是对他们说：感谢你们，你们是富爸爸。”³林的选择是后二者（第三项是第二项的升级版），即心存感激，保持沉默。其实马华文学的研究者并不多，有胆去批评特定流派的写作者写得不

¹ 文中说是回应我的〈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南洋文艺》，2013年6月25日）那是为该年七月在新纪元学院召开的“理论与马华文学”研习营而写的“广告词”，真正的回应是在该研习营上宣读的〈为什么马华文学需要理论——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后以〈审理开端——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刊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13年第十六期），之后收入我的《华人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我这篇文章已预先回应了〈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我的回应千言万语，可以归结为：所谓文学性的争议，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个实践的问题。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剩一张嘴。

林建国的后续回应包括万字长文〈文学性的奇幻之旅〉（《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3年12月1日、12月8日），我对此作了简短的、带着玩笑意味的回应——〈句号。后面〉（《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3年12月9日）因为其实已无需回应。林教授大概被激怒了，很快的又回应了篇〈抛砖引玉〉（《星洲日报·文化空间》2014年1月6日）。多年过去，好多理论如果不是已成老生常谈，就是已然破产。而我们的对话早就结束在〈审理开端——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甚至更早的〈方修论〉（2000）。

本讲稿并非对林教授的回应，因为主办单位把我和林教授放在一块（对我而言这是个奇怪的设定的语境），且预设的听众对马华文学（或华文文学）可能没什么了解，因此我只好选择一种特殊的说故事方式——与个人经历有关的路径——来介绍这支华文文学。为了减少沟通障碍，我还在讲稿末附了三个关键词解释，包括了文学性。我对这概念的解释只有115字。听众如果嫌不足，或不嫌烦，不怕晕船，可向林教授索取万字宏文〈文学性的奇幻之旅〉拜读，网络上已检索不到。（按：本文只保留了“文学性”这一关键词，其他两个比较没有争议，可略。）

² 林建国，〈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2013）《马华文学批评大系：林建国》（桃园：元智大学中语系，2019），页278。这里选择〈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作为故事的引子，原因之一是它被收入《林建国卷》，表示作者自己承认它有价值。

³ 同上注。

好的更少⁴——没有多少人愿意得罪作者，更何况是在伦理上犯罪。这些话从受过完整比较文学训练、熟谙各种“大国理论”的林教授道出，格外的意味深长。原来马华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触的。因此林这篇文章也解释了另一个马华文坛长期的现象：评论文字之匮乏。如果你从事文学批评，面对马华文学那股“庞大的气场，豪气外加骨气”、那股“无价的精神资产”，你没有太多选择，即便不愿心存感激，也应保持沉默，千万别说他们写得不好，否则在伦理上你就犯了罪。为什么马华文学如此神圣？它真的如此神圣吗？还是说，论者不过是转移焦点，以解释他自己为什么自〈方修论〉之后，在马华文学研究上近乎二十年的空白。可能是为了给这二十年空白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而发明出上述的“伦理学解释”——似乎什么都不做才是王道，才是伦理上正确的。

制作马华文学

林的这番解释是典型的“维持现状”论，对改变现状当然毫无帮助。而且一个明显的漏洞是，几乎全然忽视这三十年非“现实主义”阵营的马华文学生产⁵。不知道他对这些被马华现实主义者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派”是不是也“作出文学史的选择，对他们保持沉默；对他们说：感谢你们，你们是富爸爸”？还是延续〈方修论〉的基本论点，认为身处资源分配不均、贫乏的第三世界，再怎么努力都是徒然的，写不过第一世界、富国的作家，注定是穷光蛋⁶，写了也是白费？而经典之所以缺席，部份原因也在于文坛学界典律建构的工作做得不够。这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论述，包括宏观问题的重新问题化，及个别佳作的细致分析。二是选集编纂，如能辅以具体的作品分析更佳。这是80年代末以来留台学人比较有计划展开的工作。从《赤道形声》、《赤道回声》、《一水天涯》、《别再提起》、《马华散文史读本》、《马华新诗史读本》到《百年华文文学选·马华卷》

⁴ 比较突出的是被林建国称许为“具有无与伦比的论述能力”（〈大山脚学的起手式〉《林建国卷》，页247）的马华现代派旗手温任平。作为马华现实主义的论争对手，80年代马华文学场域最有象征资本的作家，他必须做出判断。温任平在《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总序〉老实不客气的指出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在于“思想主题狭隘化，以及对文字技巧的普遍忽视”、“主题简单化、思想公式化”，《马华当代文学选》（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1984），第二辑（小说），页6、7。这判断是公允的，很容易证实。

⁵ 唯一的例外也许是辛金顺，见其颇为夸诞的〈理想诗人之路〉（《林建国卷》）。

⁶ 在〈方修论〉里，林在嘲讽詹明信国族寓言说时顺便轻蔑了鲁迅的小说（“这种表现平平的第三世界作品（詹明信的例子是鲁迅）”《林建国卷》，页129），用的是某些崇洋的比较文学学者典型的态度。鲁迅尚且如此，其他的更无足论矣。可见林的沉默应该有两种，感激的沉默，以及轻蔑的沉默。2000年后，我记得他对我的《由岛至岛》和张贵兴的《我思念的南国公主》在《中国时报》开卷上都发表过语调轻蔑的书评。

等。论述的部分成果，可见于陈大为、钟怡雯编，《马华文学批评大系》留台学人部分，及个别作者的论文集及创作集。简言之，二十多年来，“经典缺席”的贫困问题被我们一定程度的解决了。

个人方面，1992年引发经典缺席论争、1997年撰文批判马华现实主义；再之前的1991年（和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撰于同年）尝试为马华文学的典律建构一个“文学自身”的标准，并以几位留台代表作家的代表作为正面举例（〈马华文学的酝酿期？——从经典形成，言/文分离的角度重探马华文学史的形成〉⁷）。这篇文章虽然比较粗疏（对马华文学的既有累积掌握不足），但勾勒的问题，及对文学性的强调其实延续60年代以来白垚以《蕉风》和《学生周报》为舞台展开的新诗革命、温任平等短命的现代主义运动。但其后的马华文学选集（不论前述留台人编选、在台湾出版的，还是在马出版的如《与岛漂流》等，虽有少数酬庸，或题材考虑，大部分都不能不首先考虑作品的艺术性）编选集必须做出选择和判断，选什么、不选什么都必须给出（学术的、文学的、文学史的）理由，不是乡愿式的“感激的沉默”可以糊弄过去的。选择、做出决断才是伦理上负责的态度。

二十多年过去，对我而言，马华现实主义已成历史遗迹，研究上也没有什么推进，也许大家都默默遵守着林氏两大伦理守则——沉默，感激，或许沉默即感激。但那和视而不见有什么差别？

典律建构之外，要深入了解马华现实主义，当然还是必须回到个案⁸。

现实主义个案

1991年林建国的著名论文〈为什么马华文学〉看似复杂其实简单的为马华文学寻找存在的理由：当华人、华文、华语流向南方，流向中国的域外，那异样的存在，就注定了一种新文学的诞生，它不需要文化资源的奥援。实际情况当然没那么简单。只需“反映现实”，不需要任何文学本身的要求？

为什么写不好依然可以持续写一辈子？那种意志的根源是甚么？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撑是不可能的。

华人移民南洋六百年，为什么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才有文学？除了相应的主客观条件——诸如现代印刷媒体、白话文、五四新文学作为模板/

⁷ 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

⁸ 近年在马华文学上比较有意思的发展是庄华兴对被忽略的早期流星式左翼作家的考察，从戴隐郎到铁戈、许杰、野火（林晃升）等，及黄琦旺对马华50年代早期现代派的考古。

模仿对象，作为先驱的南来文人把五四一代的启蒙与教化的文学工具论（“为社会而艺术”）也传了下来，那可以说是最初的、寿命最长的“写作的理由”，“社会”是它的欲望对象，审美要求是次要的。当社会写实主义引进中国，随左翼文人快速南传之后，日本南侵造成的亡国危机，让工具论更其绝对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共的文艺指导原则后，南洋左翼欣然景从；其后随着中共取得政权，教条阶级论更造成美学上的彻底禁欲，文学不是作为艺术品被创造，而是作为某种政治工具。在星马，“反映现实”成为文学存在的唯一理由，“现实”是它的欲望对象。而“反映”那“现实”的程序，就具现在马华现实主义的历史里。

但那作为欲望对象的现实到底是什么？

不同的欲望对象源于不同的主体设定。〈审理开端——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已尝试揭露我和诸争辩对象之间主体位置的不同。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捍卫者而言（当然包括陈雪风），马华现实主义文学是自30年代以来由数代人集体写下的钢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是马华文艺独性（它的地方色彩、“反映现实”，甚至文学上的缺失）之体现。在历史中被本质化为一种神圣般的存在，它提供了模式，那模式及对艺术性、艺术技巧的禁欲保障了它清教徒般的神圣性，因此任何挑战争辩都是一种对信仰的冒犯。⁹可悲的是，曾经的困境（限制它做得更好的那些主客观因素，那现实）被内化为它的本质属性。他们对自己的爱很可能已然聚焦于伤疤上，但因为它被不同立场的人说破了，反而需要拼命捍卫。

二十多年来，我讨论过几个现实主义个案，方北方（方作斌，1918-2007），雨川（黄俊发 1940-2007），金枝芒（陈树英 1912-1988），贺巾（林金泉，1939-2019），驼铃（彭龙飞 1936-），对马华现实主义问题因此有不同的了解。这些个案可分两类，一类是马共阵营内的，一类是非马共阵营的。先谈后者，有的是能力不足，以为那样写作就是至境（方北方）；有的没机会受比较好的文学教育，以致最基本的技艺都无法掌握——比如雨川¹⁰（试比较艺术家的陶制品和胶杯之间的差距）；有的认为文学不必仰赖技艺，平铺直叙就是天籁（驼铃）¹¹；马共阵营的其实比较特殊，譬如贺巾，选择长篇小说的形式，但那样的小说却像自传，全然沿着自身的经历展开——拒绝跳出自身经验的视野——那为什么不干脆写自传

⁹ 这是我多年来“触犯”马华现实主义得到的教训。最近的收获见于〈从华人史看马华文学〉，以驼铃和一批老牌现实主义者在“方北方事件”后创办（1989）并延续迄今的《燻火》文学杂志为考察对象。

¹⁰ 黄锦树，〈书写困难与困难的书写〉《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增订版）。

¹¹ 黄锦树，〈从华人史看马华文学〉（未刊）。

呢?¹² 驼铃的马共小说也是沿着同样的路径展开。甚至金枝芒那些写坏的作品(或未及修至完善者,如《烽火牙拉顶》),也一样的贴近经验材料(差别在于金枝芒用的是集体经验),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只有直接经验才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和真实性,因此驼铃的《寂寞行者》会大篇幅的去“抄写”马共中委张佐的回忆录,流军的马共小说被批评只靠采访而来的间接经验,甚至金枝芒的马共小说也会被某些人诟病凭借间接经验¹³。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从经验到文学作品,那文学和非文学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大才如金枝芒留下的作品,也见证了那样的历程——材料和作品之间的距离——文学和非文学之间的距离。

那被归为现代派的

相较于 60 年代从港台(及法、英)引介的强调审美特性的文学主张,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学观(或者说,马华文学有两种自我意识)。一种是晚清以来,从日本学界转手,参照西方象征主义以降的美文(Belles-letters)¹⁴,既作为新创建的大学文学科系的基本认知¹⁵,也作为新文学创作之基本预设。在启蒙与教化的文学观兴起后,它被边缘化为少数群体的文学信仰(如京派,象征主义,早期现代主义)。60 年代当白垚引介现代主义时,不止港台当代的现代实验,还包含了中国 40 年代昙花一现的现代主义。在大陆,当极左成为王道,它一直被压抑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马华现实主义因为没有强势的政治作为后盾,即便援用和大陆极左言谈一模一样的暴力修辞来攻诘现代派这眼中钉(文艺副刊之外,更集中于《浪花》、《火炬》之类的刊物¹⁶),但没法实质上消灭他们,于是只好勉强忍受他们作为文学场域里的竞争者,持续的口诛笔伐¹⁷。但真正的战役取决于受众——各自的作品、论述,编纂的选集等,及整个文学体制。

虽然我并不了解学院里的马华文学教育是怎么对待马华现实主义的¹⁸,但包

¹² 黄锦树,〈在或不在南方〉《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台湾:麦田出版,2015)。

¹³ 对那些人而言,我辈不依傍马共经验的写作当然更等而下之了。这在文学上当然是相当愚蠢的争论。我的争辩见〈在或不在南方〉。那些奇奇怪怪的意见参 21 世纪出版社编辑部,《缅怀马新文坛前辈金枝芒》(吉隆坡:21 世纪出版社,2018)第二部分所收诸文。

¹⁴ 铃木贞美著、王成译,《文学的概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四章〈翻译词“文学”的诞生〉。

¹⁵ 见陈国球,〈文学立科——《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氏著《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北京:三联,2013)

¹⁶ 不只政治清算,更是道德上的抹除。

¹⁷ 驼铃的〈蚍蜉撼大树〉(《烽火》第 45 期,2011 年 8 月,页 9)是个相当有代表性的例子。

¹⁸ 马大中文系、拉曼大学中文系的马华文学课程教本,由许文荣和孙彦庄主编、马大中文系毕

括花踪、海鸥之类的文学奖，自开办以来，挑选作品都不能不首先考虑它的文学性，而不是“反映现实”。甚至评审，也越来越少“现实主义”，他们的权威性在流失。另一方面，十多年来美国学界的华语语系(sinophone)研究，虽多涉及马华文学，但谈马华文学时，也多关注留台的作者，绝少以马华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为讨论对象¹⁹。

很显然，自建国以来马华文学的写作者可能已分化为两个对立、几乎不可能对话的场域。这不是简单的重复 40、50 年代马来亚华人政治上的国/共、右/左之争，以左翼政治为潜在信仰的作为一种遗产，对新的世代，尤其是中共文革结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国的革命梦，也以文革为一个句点²⁰），苏维埃制度的恐怖、暴政与反智，对意识形态思想上层建筑的全面操控（一切都得听党的，如中国大陆现今依然严格的出版审批），不可能对那种体制心存幻想，它所投射出来的对文学的政治设想及实践，在现今的文学场域里也没有竞争力。文学爱好者的自我教育也与 40-60 年代红潮氛围里成长起来的世代大不同，不敢轻忽技巧的学习。换言之，马华现实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滞留，可能真的已“后继无人”（现实主义自 80 年代以来就不断哀叹的“后继无人”应放在这样脉络下理解）。

两个路标：《吉隆春秋》与《饥饿》

自 1960、70 年代，全然不受马华现实主义教条影响、和台湾的现代派更具亲缘性的大马留台文学渐成气候，而真正的里程碑或许要数 1986 年李永平脱卸背景负担、备受肯定的《吉隆春秋》，那是全然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佳作²¹，我把它视为文学性满溢的例子²²。但在另一极的马华现实主义也并非没有佳作，完成于 1959，比《吉隆春秋》早完成二十多年，却比它晚二十多年广泛流布（2008 年方由吉隆坡 21 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饥饿》，我把它视为文学性零度的杰作²³。劣于它的，则是文学性为负的，在马华文坛比比皆是。《饥饿》之所以能在现实主义群体中鹤立鸡群，一定程度依赖于金枝芒(陈树英 1912-1988)本

业生协会、马大中文系联合出版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2012）虽然分类怪异，也选了些战前的小说文本，但马华现实主义的文本比重相对不大，很多“名家”都被“保持沉默”了。

¹⁹ 即便是宣扬“反离散”的史书美，也忽略了马华现实主义者或许才是她该敬礼的对象。

²⁰ 在大陆，比较可悲的是，由于迄今掌权的红二代是文革的实际获利者，毛泽东和斯达林都是他们的偶像，那种集权统治作为模范不无反复的可能。

²¹ 在 1991 年，林建国和我的论文都围绕这部小说反复思考。

²² 更其满溢的是张贵兴的后期小说。

²³ 见我的〈金枝芒的《饥饿》和我们的贫困〉，《季风带》第 12 期(2019 年 6 月)。

身的文学能力²⁴，金枝芒并非不重视文学技巧，《饥饿》里就包含了一些相当现代的技巧²⁵。

当然，零度是个反讽的说法。事缘参与中文长篇小说一百强大马区评选的大马专家学者竟然以“严肃与文学性不足”来打发掉《饥饿》，很显然接受当代文学性教育长大的一代人已无法欣赏那和他们的品味不同的文学作品——既保留马共部队内部固有的政治教条（作为信仰）、苏俄革命小说的程序，又能以写实的手法、寓言构造写下马共的致命困境。也许对于大部分当代读者而言，它的文学性难以辨认——那其实不是它的问题，而是读者的辨识系统的问题，那也可以说是《饥饿》这样的作品给马华文学提出的问题。但《饥饿》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同属马共阵营的贺中的作品就无此力量，非马共阵营的“现实主义”（即便是方北方）的作品，也没法达到这一高度。那样的现实主义作品，其文学性可能就是“负”的了。

多年来，《吉隆春秋》一直是台湾学界认可的马华小说的最高成就，它的“文学性满溢”建立在它拒绝和自身的历史对话，因此台湾读者不会觉得有什么东西猜不透（当年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对《吉隆春秋》的背景还原是徒然的），凭新批评就可以完整的掌握它。但代价是，它欠缺历史的奥援。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美学盆景。那样的作品，历史化（马克思主义、后殖民论述最强调的分析方法）是无效的，因为它用美学的手段切断了文本与历史的连结。但它的长处是，它因此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普遍性，超越了马华文学，甚至可以说，成功的摆脱马华文学自成立以来就援以证成自身存在的马华艺术的独特性——首先是地方色彩，再则是历史的差异性²⁶。《饥饿》兼具这二者。它需要历史化，因为它作为小说的存在即是与历史对话。在最糟的情况下，马华现实主义作品妄想成为历史，华人史，以华人史为其欲望对象（包括方北方，驼铃）。因为文学能力、文学技术及文学观念太糟（技术太糟的部原因在于对技艺的漠视，观念上把文学视同报导，抗拒戏剧化），那欲望成为不可能的欲望，那样的作品在美学上不能自立，既不能证史，也不能存史²⁷。

²⁴ 在他以殷枝阳、乳婴等笔名写的短篇小说即被收入《马华新文学大系》。

²⁵ 详细的分析见我的〈最后的战役——论《饥饿》〉《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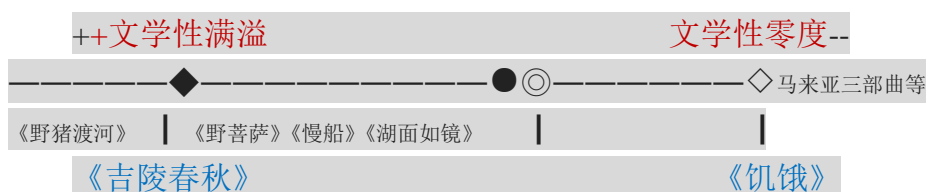
²⁶ 因此，要读懂《吉隆春秋》，你对婆罗洲的殖民历史、砂朥越的胡椒产业、华人移民史、东马华人的方言群结构、原住民的历史纠葛一无知也没关系，知道了也没甚么帮助。

²⁷ 见我的，〈从华人史看马华文学〉（未刊，2019年7月檳城文史研习营发言稿）

中间地带

那有没有中间地带呢？

《吉陵春秋》的坐标形成之后，那些也是被划归为现代派的马华文学，不止以“文学自身”为欲望对象；既注重文学的艺术技巧，同时以大马现实为关照（不是用老派现实主义的新闻之眼的关注方式），是不是可以视为马华现实主义之自我更新与进化——换言之，所谓的现代派，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不是其实是现实主义的演化版？图式如下：



在这表里，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意义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和选集编纂、文学奖、文学教学等时做的判断、选择不同，虽然都关涉作为操作观念的文学性（而非理论家好高骛远空谈的本体论、伦理学上的差异），这是文学行动者文学实践上的选择。

但马华文学并不必然以“文学本身”为其欲望对象，现实主义者的欲望对象从革命现实到一般现实，甚至妄想成为华人史；大马建国后，国家文学一直是境内马华文学永远满足不了的欲望对象。

【征引文献】

21 世纪出版社编辑部，《缅怀马新文坛前辈金枝芒》，吉隆坡：21 世纪出版社，2018。

李永平，《吉隆春秋》，台北：洪范出版社，1986。

林建国，〈文学性的奇幻之旅〉（《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3 年 12 月 1 日，12 月 8 日）。

林建国，〈抛传引玉〉（《星洲日报·文化空间》，2014 年 1 月 6 日）。

林建国，〈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2013）、〈大山脚学的起手式〉、〈理想诗人之路〉《马华文学批评大系：林建国》，桃园：元智大学中文系，2019。

金枝芒，《饥饿》（1959），吉隆坡：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

陈国球，〈文学立科——《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氏著《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北京：三联，2013。

温任平〈总序〉《马华当代文学选》，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1984。

铃木贞美著、王成译，《文学的概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黄锦树，〈从华人史看马华文学〉（未刊，2019 年 7 月槟城文史研习营发言稿）。

黄锦树，〈金枝芒的《饥饿》和我们的贫困〉《季风带》第十二期，2019 年 6 月。

黄锦树，〈最后的战役——论《饥饿》〉、〈理审开端——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台北：麦田，2015。

黄锦树，〈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2013 年 6 月 25 日，《南洋文艺》）〈句号。后面〉（《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3 年 12 月 9 日），均收入《注释南方》，八打灵：有人出版社，2015。

黄锦树，〈马华文学的酝酿期？——从经典形成，言/文分离的角度重探马华文学史的形成〉《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96。

【附录】

名词解释：文学性

指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一般指经由语言的特殊操作程序，譬如有意的藉由意象、隐喻、节奏、韵律等，使自然语言具有诗意。或经由特定的叙事程序，让故事具有文学意味。最早由俄国形式主义者 Roman Jakobson 在 1920 年代提出，作为文学形式分析的基本预设。